

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

高学德 翟学伟

提要: 以往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大都分别以城市居民或农民为研究对象而独立进行, 缺乏对城乡居民的直接对比。本研究通过对来自全国六大地区的问卷调查, 考察了当前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现状和特点, 并进一步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 当前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 但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要低于农民的政府信任度, 且城市居民比农民表现出了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都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都有较强的解释力, 但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研究对已有关于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结论提出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 政府信任 制度主义 文化主义 比较研究 城乡居民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体制是创造和维持公众对于一个稳定的合乎道德的社会秩序之期望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之一。当这种政治体制得到充分信任时, 它能够阐释价值观念和目标、有效地使用权力并防止滥用权力(巴伯, 1989)。而信任对于政治体制作用有效性的发挥是必不可少的(Parsons, 1969; Gamson, 1968)。公众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 特别是对作为这种体制重要载体的政府的信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期待。对政府的不信任不仅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激发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怀疑、猜忌、矛盾和冲突, 引起社会共有的伦理规范的混乱和危机, 导致民众对国家和政府合法性认同的下降, 甚至还会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权危机。近年来, 伴随着一些重大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资助, 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问题的凸显和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的不断发生，对中央及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已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当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而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中国基层政府的信任状况正趋于恶化（Li, 2004；肖唐镖，2005；胡荣，2007）。那么，这一信任层级递减现象在遭遇工业文明冲击的城市社会和深受传统农业文明影响的乡村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呢？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并将传统中国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分化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塑造了城里人和农民具有差异性的政治心理和行为特点。胡荣等人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评价要略低于农村居民的评价，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却高于农村居民（胡荣等，2011）。那么，如何来解释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高于地方这一现象呢？该研究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关于哪些因素影响政府信任，国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Wong et al., 2009），但在国内却鲜有研究运用以上两种分析路径比较和解释中国社会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差异性的。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呈现出何种样态？城市居民和农民对各级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2）是现实的制度变量还是根植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心理，抑或是这两种因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政府信任？它们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政府信任及现状

政府信任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当前学术界关于政府信任的概念界定较为模糊。很多学者将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交互使用，但他们都强调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在本质上是公民对政府、政治体制以及政府人员等的态度评价或信念、信心，这种评价是基于公民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预期或期待而产生的（Miller, 1974；Hetherington, 1998；Shi, 2001；Jenny,

2005），当心理预期未能配搭以政府行为或效能的改善，就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的研究发现，不仅各国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不同国家内部政府信任的各层次往往是不平衡的。米勒和李斯特豪格（Miller & Listhaug,1990）的研究发现，1964 至 1986 年间的北欧国家，如挪威与瑞典，政府信任是持续下降的，而在美国，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政府信任分布微弱，呈现一种倒金字塔型的结构（Tyler & Konisky, 2009），民众更加信任地方政府和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Jennings, 1998）。政府信任下降的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而是一种国际间的共同现象，其他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也都面临相同的问题（Nye et al., 1997）。对日本人的政治信任的研究也发现，公民对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Pharr,1997）。

与西方国家关于政府信任现状的大量文献相比，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我们通过梳理近十年对全国范围内较大样本进行调查的实证研究后发现，对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结论：一是认为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人们对中央政府最信任，其次为省级政府，最不信任的是乡镇政府或街道办等基层政府（Shi, 2001; Li, 2004; 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一结论；二是认为政府信任状况并不是线性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状况，如王向民（2009）的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U”型结构，李连江（Li, 2004）发现虽然农民更加相信中央政府，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却因不同的内容而出现了分化：农民普遍相信中央政府的愿望，但并不相信将这种愿望加以实现的能力。还有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出现提升而非下降（肖唐镖、王欣, 2010）。

（二）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与描述政府信任的现状相比，考察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可能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对政府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从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来看，政治信任可以被解释为公众对物质利益的理性计算以及政治领域中重要事件的结果（Riker, 1990），即

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人们对于政府的整体表现评价低落，以及对于政治任务幻想的破灭，是导致政府信任下降的主要原因(Volcker, 1999)。有较多的证据支持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信任的理论解释，如在西特林(Citrin, 1974)看来，政治官员和机构的绩效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而总统、国会和政府的能力以及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都会影响政治信任的水平(Hetherington, 1998)，在民主化的台湾，政治信任同样更多是和政府绩效相联系的(Shi, 2001)，胡荣等人(2011)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与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强调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效能进行理性评价的观点不同，文化主义解释路径更注重从更宏大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来解释政府信任的形成机制，并成为当前政府信任研究的主流。在文化主义者看来，政府信任是人际信任的扩展，产生于个体在其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塑而成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政府绩效并非解释政府信任的独立变量，政府信任因不同的文化心理而具有跨文化和跨社会的差异性(Putnam, 1995; Inglehart, 1997)。近年来，有学者将以上两种解释路径相结合来探讨中国政府信任的形成机制，如陈捷等人(Chen et al., 1997)在研究中国经验时将政治支持分为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并发现民众对中国政府有高度的情感支持，而有较低的工具性支持。这事实上支持了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史天健(Shi, 2001)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府信任做了对比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政府信任更受政府绩效的影响，而中国大陆的政府信任更受传统价值观的制约，价值取向的不同基本解释了它们之间政府信任的不同。对中国香港和台湾政府信任的比较发现，制度因素(如政府绩效、生活满意度等)和文化因素(人际信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传统主义等)对两个地区的政府信任有不同的影响，但制度因素起更大的作用(Wong et al., 2009)。

对以上有关中国政府信任的研究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点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拓展。一是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政府信任的概念理解有所差异，并由此而导致的测量指标操作上的不同。此外，样本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二是研究对象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群体，特别是缺乏根植于当前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的对城乡居民的比较

研究，而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政府信任进行对比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三是对政府信任产生机制的解释方面，虽然已有研究开始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视角对中国大陆、香港和香港地区的政府信任进行比较研究，但对于中国大陆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却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探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政府信任的样态和特点，并试图运用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主流解释路径来探讨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产生机制。本研究克服已有研究将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概念不加明确区分的不足，从信任对象的角度对政府信任的概念加以清晰的界定，将政府信任看作政治信任的一个方面。信任的对象是包括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政府、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在内的各级政府。然后，利用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的较大规模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政府信任现状的城乡直接比较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最后，运用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主流解释路径来探讨政府信任的产生机制，系统比较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居民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机制，提升城乡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广义上讲，制度和文化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制度本身也是文化，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制度体现的。本研究所指涉的制度部分是政府在各个职能领域的治理效果，具体以居民对政府治理效果满意度来衡量，并借鉴了前人对制度和文化变量的选择标准，特别是有关中国居民的研究成果；而我们所选取的三个文化变量虽然在广义上与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与狭义政府职能或政府绩效关系不大。这里的文化含义，更集中于文化价值观、冲突解决机制以及文化品格方面。如此，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可以得到较好的区分。

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政府信任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越是高层政府，信任度越高，越是基层政府，信任度越低。

虽然近年各级政府机构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有较多的负面评价，但

总体来看，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中国人更信任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趋势可能并未改变。

假设 2: 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低于农民的政府信任。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人们在分散的封闭性地域中因熟悉而产生信任，这种感性的、直觉的信任经个体人格系统、行为惯例、宗教式的文化引导、威慑性的权力钳制等环节，扩展到对担负着国家、政府自身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行政体系的信任，形成了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程倩，2009）。而对城市居民而言，虽然他们仍然保留了传统中国农民习俗性政府信任关系的特质，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主观念和政治生活的改变，削弱了他们对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假设 3: 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越大，政府信任度也就越高。

制度主义强调政府信任产生于公民对政府职能或政策效果的预期和评价，因此，对政府职能或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从理论上说，我们研究的因变量是各级政府的信任，应该对不同层次的政府绩效都要有一些相关的指标来测量。但限于条件，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大体测量了各级政府的绩效，重点从司法、教育、医疗、抗震救灾、食品安全、环境、户籍、社会救助等十个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来评价公民对政府职能或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而国内已有研究也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治理绩效的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治信任；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观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孟天广、杨明，2012）。由此来看，虽然我们不能全面测量各级政府的绩效，但这些指标可以从若干侧面反映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结果，并进而考察这种评价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假设 4: 文化变量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从文化主义的视角解释政府信任有不同的路径，已有研究更多是从传统主义（Shi, 2001; Wong et al., 2009）、中庸冲突解决策略（Shi, 2001）、权威主义价值观（Solomon, 1973; 马得勇, 2007; Wong et al., 2009）和人际信任（Wong et al., 2009）等方面来分析。考虑到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对人心理和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取人际信任、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和威权主义倾向作为探讨政府信任产生机制的文化变量。具体来说，假设 4 又可以分为三个假设：

假设4a: 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人际信任越高, 政府信任也越高。

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 相信他人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农村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快使城市生活的人不得不面临与陌生人的交往, 在新的道德秩序和规范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人们很难建立起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 而这种人际信任的差别会降低他们对政府人员和政府机构的信任。

假设4b: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越倾向于采用国家解决机制, 政府信任就越高。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梁漱溟, 1988)和关系取向(杨国枢, 2004)的社会, 中国文化的基本运作法则是对均衡与和谐的追求, 当一个人与他人发生纠纷时, 当事人往往以牺牲自我、大事化小或找人调解等方式来解决, 因此, 使用“忍”或寻求私人关系摆平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居民更常使用的策略。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 民主和法制观念的渗透使大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有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法律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 把民事纠纷诉诸政府是目前中国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Michelson, 2007)。当然, 我们也不排除农民也会更多采用上访等正规渠道解决纠纷。虽然城市居民也会采用忍让及“找关系”等民间渠道解决, 但在更大范围内, 城乡居民解决民事纠纷的策略和机制会有较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纠纷解决主体对政府信任的差异。

假设4c: 威权主义倾向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威权主义越高, 政府信任也越高。

威权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城乡差异。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快使得人们追求民主和自由而不羁縻于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变得可能, 这种倾向可能在城市居民身上更为突出。

假设5: 不同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方民主社会的很多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学特征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Cole, 1973; Li, 2004)。如, 老年人更不愿意信任政治权威(Agger et al., 1961), 低收入阶层更不信任政府, 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政府信任度要高于低教育水平的人(Agger et al., 1961)。而对中国

农民的多数研究并未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之间有显著的关联(Shi, 2001; Li, 2004), 相反, 中国农村教育水平较高者对党委的信任反而低于教育水平较低者。此外, 李连江(Li, 2004)的研究也发现, 低收入和高收入者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都低于中等收入者。同时, 我们考虑到阶层地位会影响到政治参与(刘欣、朱妍, 2011), 并可能会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因此, 本研究也将受试者主观的阶层认同作为政府信任度的预测变量。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测定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10月—11月实施的全国性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了样本省、样本市、样本县、样本乡镇和样本村。本次调查抽取了南京、天津、重庆、深圳、兰州、银川等六个地区的样本总量共计5500个。抽样采用多段抽样法, 城市分为区级——街道——社区三段, 按照3-2-1的标准进行, 即每个城市抽取3个行政区, 每个行政区抽取2个街道, 每个街道抽取1个社区, 共计抽取6个社区, 每个社区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农村则由县—乡/镇—村三段进行抽样, 按照2-2-1的标准进行, 即每个农村抽取2个行政村, 每个行政村抽取2个乡/镇, 每个镇抽取1个自然村, 共计抽取4个自然村, 每个村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年满18岁及以上的公民(不超过70周岁)。总共发放55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5296份, 回收率为96.3%。其中城市问卷3138份, 农村问卷2158份, 分别占总样本数的59.3%和40.7%。^①

(二) 变量选择与测量

1.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 也是因变量。本研究将政府信任的对象界定为各级政府机构。因此, 政府信任的操作性测量也就

^①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 由于各个变量的有效案例数不同, 不同的模型使用的有效案例数可能小于该样本数, 具体参见各模型列出的有效案例数。

是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政府、区县政府、基层街道办/乡镇政府”等的测量,要求被访者在李克特五点量表上就自己对以上五级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共有“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说不清”、“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城市和农村样本的这5个项目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Cranach's alpha)分别为0.926和0.901。

2.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代表了影响政府信任的制度变量,它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它既可以体现为现实或实际的客观结果,也可以通过公民的主观评价来反映。本研究采用主观评价而非客观的政府绩效,主要考察公民对政府各重要职能或制度建设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包括“食品监管、抗震救灾、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慈善事业、司法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10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各级政府机构的所有职能。对以上10类政府绩效满意度的评价均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共有“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说不清”、“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城市和农村样本的这10个项目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0.908和0.861。以上十项变量均为定距变量。

3.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本研究中的文化变量之一。这里所指的人际信任是指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即普遍信任而非特殊信任。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诚实可信的”的陈述进行同意与否的判断,共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

4.威权主义倾向

威权主义倾向是本研究中的第二个文化变量,它是指公民对权威(包括政府官员)的遵从和服从程度。我们选择问卷中的“领导就像家长,我们应该听他们的话”项目来测,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

5.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本研究中的第三个文化变量。纠纷是任何一

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纠纷解决策略和机制的选择却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蕴。本研究选择较为常见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考察政府信任的预测变量。参照程金华、吴晓刚（2010）的做法和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将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分为“不采取行动”、“民间解决机制”、“国家解决机制”及其他。“不采取行动”即“忍”或自认倒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指通过非政府主导的途径解决，包括依靠自己、通过私人关系或通过媒体等途径，国家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以官方或政府为主导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如通过法律（如打官司、上访等）或找消费者协会（由于消费者协会在我国更具有官方性质，因此我们将此归入此类）。本研究首先要求被访者回答“您曾经是否因购买行为与卖家发生过纠纷？”，然后要求做肯定回答的被访者进一步回答他（她）是如何解决纠纷的，回答选项包括“自认倒霉”、“通过私人关系，找人摆平”、“找卖东西的人理论”、“求助媒体”、“打官司”、“找政府”、“找消费者协会”、“说不清楚”和“其他”，被访者可以选择一种或多个选项。研究者根据以上标准进行归类。该变量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赋值方法为：0=不采取行动，1=民间纠纷解决机制，2=国家纠纷解决机制，3=其他。因选择“其他”人数较少，研究未将此纳入回归方程。

6.其他控制变量

遵循以往的研究传统，我们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阶层认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这些变量中，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其他变量为定距变量。其中，性别赋值为：0=男；1=女；民族赋值为：0=汉族；1=少数民族。婚姻状况赋值为：0=已婚；1=未婚；2=离婚或丧偶。政治面貌赋值为：0=中共党员；2=共青团员；3=群众；4=民主党派及其他（因人数较少，未作分析）。教育程度的赋值分别为：0=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含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收入为个人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年龄为实际年龄，范围在18-80岁之间。阶层认同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分别赋值为1-5。为考察收入和年龄与政府信任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又加入了收入和年龄去对数后的平方。各预测变量基本情况见表1。

表 1 各预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预测变量	城市居民样本			农村居民样本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制度变量						
食品安全	3138	2.62	1.28	2158	3.41	1.18
抗震救灾	3138	3.93	.90	2158	4.28	.79
环境保护	3138	2.99	1.22	2158	3.74	1.07
义务教育	3138	3.43	1.14	2158	4.13	.88
司法制度	3138	3.25	1.07	2158	3.79	.92
户籍制度	3138	3.35	1.08	2158	3.89	.93
养老保险制度	3138	3.46	1.09	2158	4.12	.95
医疗保险制度	3138	3.40	1.13	2158	4.19	.88
社会救助制度	3138	3.24	1.10	2158	3.81	1.03
慈善事业	3138	2.97	1.14	2158	3.60	1.03
文化变量						
人际信任	3138	3.51	1.02	2158	3.73	1.02
威权主义倾向	3138	2.69	1.18	2158	2.93	1.19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忍耐	2140	.08	.22	923	.17	.39
民间解决机制	2140	.66	.47	923	.67	.47
国家解决机制	2140	.16	.23	923	.12	.27
社会人口学变量						
性别（男=0）	3138	.53	.50	2158	.51	.50
年龄	3124	39.15	13.81	2147	41.33	12.91
年龄的平方	3124	1723.74	1184.81	2147	1875.17	1117.22
民族（汉族=1）	3138	.96	.17	2158	.80	.40
教育水平	3135	2.54	1.19	2155	1.06	0.95
收入	2719	10.35	.96	1917	9.46	.96
收入对数的平方	2719	107.94	19.81	1917	90.27	17.60
阶层认同	3120	3.78	.81	2158	2.92	.75
婚姻状况						
已婚	3138	.73	.44	2158	.89	.31

未婚	3138	.24	.43	2158	.09	.28
离婚或丧偶	3138	.03	.16	2158	.02	.13
政治面貌						
党员	3138	.23	.43	2158	.09	.29
团员	3138	.15	.35	2158	.06	.24
群众	3138	.61	.49	2158	.85	.36

五、研究结果

（一）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现状

为更全面考察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现状和特点，我们构建了政府信任的两个指标，一是作为定距变量的信任度，即被调查者在五点量表上的平均数作为总的政府信任度指标，但仅仅使用平均数会掩盖政府信任状况的差异性。为此，本研究又对原始的五个问卷选项重新归类，将“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归为高信任度，而将“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和“说不准”归为低信任度，^①然后统计城乡样本两类信任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同时，我们对城乡属性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之间的关联进行卡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城乡居民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评价

^① 我们对回答为“说不准”的受访者的处理与现有关于社会信任研究的归类相同（如 Alesina & Ferrara, 2002; 李涛等, 2008），把他们归类为社会信任较低的一类，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处理方法，这也与中国人回答问卷时更具保守倾向类似。

政府层级	城乡	信任度%		平均数 (标准差)	Pearson χ^2 值
		低信任	高信任		
中央政府	城市	20.5	79.5	4.09 (.96)	113.13****
	农村	9.6	90.4	4.47 (.82)	
省级政府	城市	30.7	69.3	3.81 (.93)	144.48****
	农村	16.2	83.8	4.21 (.94)	
地市政府	城市	40.2	59.8	3.61 (1.06)	116.83****
	农村	25.9	74.1	3.95 (1.08)	
区县政府	城市	47.2	52.8	3.44 (1.08)	169.03****
	农村	29.4	70.6	3.83 (1.12)	
乡镇政府 (街道办)	城市	50.2	49.8	3.36 (1.04)	110.54****
	农村	35.6	64.4	3.64 (1.02)	

由表2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首先，整体而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有较高的政府信任度，这一状况无论是从选择高信任度的人数比例（即使是高信任度比例最低的城市居民对街道办的信任而言，也有将近49.8%的人选择高信任）还是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平均数（对任何一级政府信任度的平均数均远高于中数2.5）来看都有较高的同一性，而且从信任度分数的标准差来看，公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更趋一致。而从各级政府信任度的比较来看，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评价最低的是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这一结果既与已有的研究较为一致（Shi, 2001; Li, 2004; 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同时也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1。

其次，从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来看，城市居民对任何一级政府的信任均低于农民的信任，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平均数比农民的信任度平均数普遍要低0.3-0.4，而且，低信任度的人数也要少10%-15%，这说明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整体而言要低于农民的政府信任度，研究结果支持本研究假设2。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通过考察城乡居民样本对各级政府不信任比例的增幅可以发现，城市居民不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

地市政府、县区政府和街道办的比例分别约为20%、30%、40%、47%和50%，而农民对以上各级政府不信任的比例分别约为10%、15%、25%、30%和35%，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自上而下各级政府不信任的比例以10%的比例递增（对县区政府和街道办的不信任比例较为接近），而对应的农民的不信任比例增幅仅为5%左右，这说明，不仅城乡居民在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方面表现出差异性特点，而且对各层级政府不信任的程度和趋势也表现出不同，城市居民比农民表现出了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这与以往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刚好相反（胡荣等，2011；侣传振、崔琳琳，2012）。

（二）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深入考察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政府信任的五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各抽取了一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77.48%和72.37%，这表明，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他们都将各级政府看作同一类对象进行评价。因此，我们将这五个指标以其算术平均数加以合成并将其作为政府信任的指标。

在进行政府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研究考察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三类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水平、收入、阶层认同、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等，同时，为考察年龄和收入是否与政府信任成线性关系，我们又增加了年龄平方和收入对数平方两个变量。制度变量包括十个政府绩效变量。文化变量包括人际信任、威权主义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三个方面。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设置了6个模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预测，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预测。模型1和模型4仅仅考察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5除了控制变量外，还加入了十个制度变量作为自变量。模型3和模型6在社会人口学变量和制度变量之外又增加了三个文化变量。我们希望通过以上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考察政府信任是否及如何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表3 城市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社会学研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人口学变量			
性别 ^a	.026	-.014	-.023
年龄	-.036	.191	.110
年龄平方	.270*	-.016	.056
民族 ^b	-.005	.013	.022
教育水平	-.106****	.037**	.035
收入对数	-.188****	-.040	.004
收入对数平方	.083**	.006	-.018
阶层认同	.126****	.040**	.063****
婚姻状况 ^c			
未婚	.000	-.003	.006
离婚或丧偶	-.050**	-.025*	-.022
政治面貌 ^d			
共青团员	-.002	-.002	.003
群众	-.052**	-.045**	-.052**
制度变量			
食品安全		.072****	.055**
抗震救灾		.112****	.085****
环境保护		.044**	.053**
义务教育		.058***	.051**
司法制度		.288****	.244****
户籍制度		.076****	.091****
养老保险制度		.034	.014
合作医疗制度		-.019	-.026
社会救助制度		.055**	.038
慈善事业		.050**	.059**
文化变量			
人际信任			.151****
威权主义倾向			.134****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e			
民间解决机制			-.018
国家解决机制			.025
常数	4.381****	1.170****	.856***
N	2664	2651	1717
R	.345	.643	.684
R square	.119	.413	.467
调整 R square	.115	.408	.459
F	27.524	80.481****	54.880****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2) a参考类别为“男性”; b参考类别为“汉族”; c参考类别为“已婚”; d参考类别为“中共党员”; e参考类别为“不行动(或“忍”)”。

表4 农村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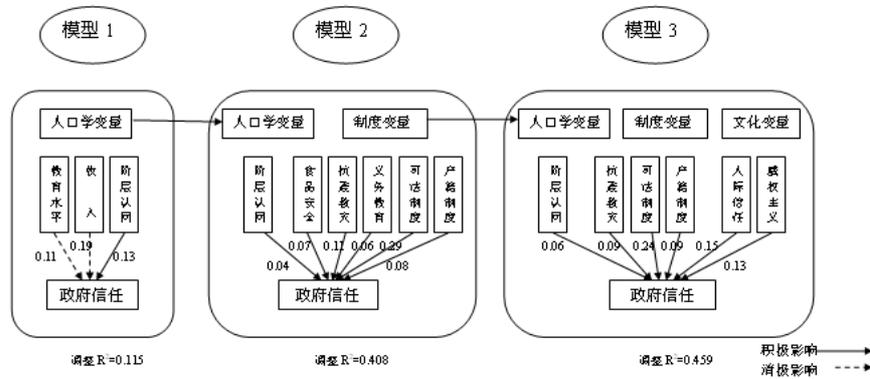
社会学研究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会人口学变量			
性别 ^a	.017	.027	.049
年龄	.356**	.353**	.473**
年龄平方	-.210	-.256*	-.410**
民族 ^b	-.014	-.022	-.030
教育水平	-.013	.022	.029
收入对数	-.048	.030	-.074
收入对数平方	.016	-.057	-.003
阶层认同	.145****	.081****	.086****
婚姻状况 ^c			
未婚	.009	.000	.013
离婚或丧偶	-.013	-.006	.000
政治面貌 ^d			
共青团员	.000	-.006	-.010
群众	-.072**	-.046*	-.042
制度变量			
食品安全		.077****	.067*
抗震救灾		.097****	.124****
环境保护		.071****	.026
义务教育		-.017	-.028
司法制度		.213****	.150****
户籍制度		.000	.046
养老保险制度		.066**	.041
合作医疗制度		.024	.062
社会救助制度		.133****	.025
慈善事业		-.012	.008
文化变量			
人际信任			.163****
威权主义倾向			.163****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e			
民间解决机制			.078**
国家解决机制			.048
常数	4.005****	1.330****	.611*
N	1864	1854	800
R	.228	.512	.558
R square	.052 ₁₇	.262	.311
调整 R square	.045	.253	.287
F	7.783***	28.222	12.921****

注：(1)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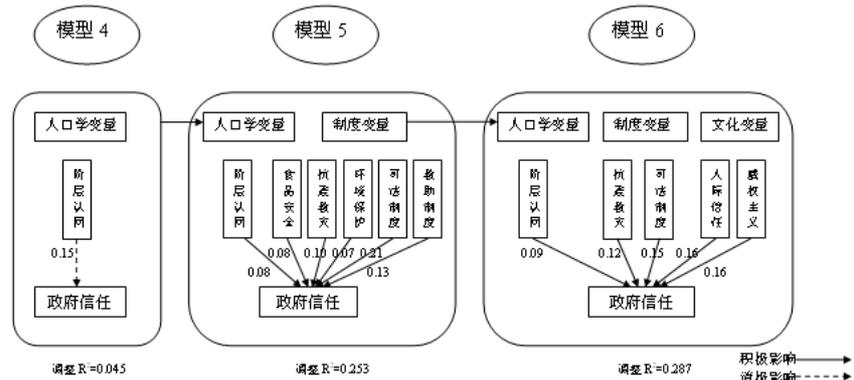
(2) a参考类别为“男性”；b参考类别为“汉族”；c参考类别为“已婚”；d参考类别为“中共党员”；e参考类别为“不行动（或“忍”）”。

为更直观、形象地显示每个模型增加不同变量后政府信任的具体变化情况，我们分别制作了城市居民和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关系图（见图1和图2）。



注：(1) 图中只列出了统计显著性达到 0.01 水平的各项效应。
(2) 图中数字为每一变量影响政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

图 1 城市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关系图



注：(1) 图中只列出了统计显著性达到 0.01 水平的各项效应。
(2) 图中数字为每一变量影响政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

图 2 农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关系图

1. 社会人口学变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总体而言，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阶层认同都是影响政府信任的最重要的因素，阶层认同越强，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等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不同的影响，而性别和民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5。

第一，就城市样本来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模型1显示，教育水平、收入和阶层认同对政府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教育水平和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而阶层认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即，教育水平和收入越高的人，对政府的信任越小，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对政府的信任越大。同时可以发现，收入对因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而收入的平方为正值，这表明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U型，即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中等收入者信任度较低。此外，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对政府信任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离婚或丧偶者比已婚者的政府信任较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要低于中共党员。第二，就农村样本来看，年龄和阶层认同是影响政府信任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年龄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倒U型（年龄对因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而年龄的平方为正值），即年轻人和年长者的政府信任度较低，而中年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阶层认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与城市居民相同，即阶层认同越高，政府信任越大。

透过以上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看似矛盾但却非常重要的现象：被学界广泛用来衡量社会阶层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两个指标，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和阶层认同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并不一致。这一结果从直观上来看确实是矛盾的，但事实上，社会阶层到底是一种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主观建构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强调社会阶层和等级的客观实在性，而布迪厄、福柯等更认同阶层或阶级的主体建构的作用。已有有关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发现，阶层的客观指标和主观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性（王春光、李炜，2002；李春玲，2004）。我们的调查中看似矛盾的结论背后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矛盾性结论，它恰恰能够引导和启示我们发现社会阶层研究中更有价值的东西：第一，以往使用客观指标来衡量社会阶层的惯常做法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社会阶层研究不能停留在根据客观指标进行分层的层面，而应关

照当今中国人的主观建构层面。一个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以及分层机制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之中。对一个社会的分层结构的理论建构也应当建立在理解该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刘欣, 2001)。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图1和图2),收入、教育水平等客观社会阶层指标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稳定性,当增加其他变量(如制度和文化变量)后,它们的效应降低或消失了,反而作为主观建构的阶层认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都非常稳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使用社会阶层的主观建构(阶层认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研究社会阶层不仅仅是想知道不同社会阶层所拥有的客观社会、经济、文化资本,更重要的是要探讨不同阶层背后的阶层意识和群体心理,而建立在主观建构基础上的阶层分类更有可能达到以上目的。第三,即使使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社会阶层也必须要考虑到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等级地位的一些独特因素,如权力。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对阶层地位高低的判断标准,权力的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因素(刘欣, 2001)。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未将权力变量加以考虑,从而减弱了客观社会阶层的贡献力,这可能也是导致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

2. 制度变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和表4的结果可知,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城市居民样本还是农民样本,他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越高,政府信任度也越高,特别是食品安全、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的政府绩效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共同的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3.1。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制度变量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表现出了某些差异。

就城市样本而言,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没有加入制度变量的各指标之前,模型1的调整 R^2 仅为11.5%,而在加入各制度变量后,模型2的调整 R^2 达到40.8%,增加了29.3%。不仅制度变量中的十个指标都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它们削弱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模型1中原本对政府信任有影响的收入、教育水平、阶层认同、婚姻状况等变量在模型2中变得不太显著或显著性下降了。而在具体的政府绩效指标中,抗震救灾、司法制度和户籍制度对政府信任有稳定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并未因文化变量的加入而削弱其影响力(见模型2和模型3)。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义

务教育和慈善事业都对政府信任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养老保险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对政府信任均无影响。

就农村样本而言，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没有加入制度变量的各指标之前，模型4的调整 R^2 仅为4.5%，而在加入各制度变量后，模型5的调整 R^2 达到25.3%，增加了20.8%。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是两个最重要也最稳定的影响因素，不因其他变量的加入（如文化变量）而改变其影响的效力。此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也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会因其他因素的加入而削弱或消失（见模型5和模型6）。户籍制度、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和慈善事业对政府信任均无显著影响。

由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假设3.2得到了证实。

3. 文化变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模型2、模型3和模型5、模型6的比较可以看出，当加入文化变量后，模型3和模型6的调整 R^2 分别提升了5.1%和3.4%，这意味着，文化变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人际信任和威权主义倾向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人际信任度越高，威权主义倾向越强，就越相信政府。但进行城乡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变量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却有所不同，人际信任和威权主义倾向并未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了某些城乡差异：城市居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对城市居民样本的政府信任度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民样本而言，采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比不行动（或“忍”）更影响他们的政府信任，越是采用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而不是“忍”的途径，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另一方面，对比模型2、模型3和模型5、模型6后发现，文化变量的加入并未使制度变量对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生变化，但却使某些制度变量对农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力显著地减弱（如食品安全和养老保险制度）甚至消失了（环境保护和社会救助制度）。这说明，相对于城市居民样本，文化变量对农民样本的政府信任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基于以上的结果分析，本研究的假设4a和假设4c得到了检验，而假设4b未得到验证。

六、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运用2011年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做的一次调查数据,比较了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现状,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政府信任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样本,都有较高的政府信任度,并且对由上到下各级政府信任度的评价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但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要低于农民的政府信任度,而且城市居民比农民表现出了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就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而言,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都对政府信任有较强的解释力,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从制度变量来看,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能显著地正向预测政府信任,特别公民对食品安全、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的满意度影响更大。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从文化变量来看,人际信任和威权主义倾向对政府信任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并未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仅对农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越是采用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相比较而言,文化变量对农民样本的政府信任有更为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政府信任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阶层认同是影响城乡居民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变量,教育水平和收入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有较大的影响,而年龄对农民的政府信任有更大的影响。

本研究有关政府信任总体现状的结果与已有的大多研究较为一致(Shi, 2001; Li, 2004; 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但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差异性的结论却与胡荣等人(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的研究有所不同甚至相反。胡荣等人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评价要略低于农村居民的评价,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却高于农村居民(胡荣等, 2011),但本研究却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民表现出了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趋势。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与两类研究所涉及的样本来源和不同样本群体的调查时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样本可比性有关。胡荣等人的研究结论来源于对不同样本群体在不同时间段的调查:城市居民样本数据来自于2008年10月对厦门岛内的30个社区居委会的居民进行的调查,有效样本为572人,而农村样本则来自于2003-2005年的问卷调查,样本既有来自于福建省寿宁县和浙江泰顺县的入户调查,也有来自于对“全国沿海和内陆不同省份”的非随机访谈,有效样本为1017人。笔者认为,调查时间的不同、抽样方法的迥异和样本特征的差异会使研究者对两类群体

的同一现象进行直接比较时带来更大的危险，由于两类样本的可比性不强，可能导致比较的结果缺乏说服力。而本研究所用城市和农民样本均为2011年11月对全国五大城市所做的调查(样本具体情况详见“数据来源”部分)，这使得两类样本的直接比较变得可能。

此外，之所以出现城市居民比农民对基层政府更不信任的现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与地方性新闻的适度放开和基层政府负面形象的曝光率有关。近年来，政府对地方性新闻的控制已经适度放开，市场化进程与管制弱化的共同作用使得媒体更加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但城乡居民对于不同媒体的接触频率有较大的差异，相对而言，农民更多接触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城市居民中有更多比例的人接触到了新媒体，如网络 and 手机短信，而新媒体更具有负面的特性，并由此造成地方政府的腐败以及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进入城市民众视野，出现了城市居民更不信任基层政府的现象。第二，农村地区的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比较差，这些原因看起来很容易做出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要低于城市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判断。但事实上，政府信任是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一种心理预期和态度，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府绩效如何影响政府信任，不能只看绝对值，而是要看相对情况。按照公平理论，城市居民对基层政府工作绩效和职能的评价不是和农民比较，农民也不是和城市居民比较，而是进行纵向比较，即拿现在的状况和以前的状况相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年来一系列兴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感受到更大的实惠，相对而言，城市居民感受到的变化和进步更小，因此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要比农民要低一些。当然，这只是可能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还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深入考察。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对中国当前社会背景下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和比较研究。就已有研究探讨中国农村或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Chen et al., 1997; 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或就大陆、香港和台湾等的政府信任及产生机制进行比较(Shi, 2001; Wong et al., 2009)而言，尚缺乏根植于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直接比较研究。本文通过纳入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并综合社会人口学因素，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首先，概括而言，我们的研究既支持政府信任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也支持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也就是说，政府信任是经由制度和两条通道而得以形成的。但这两条通道起作用的强度和对象却有一定的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履行的程度及其绩效的好坏等“硬”实力要比人际信任、传统价值观等“软”文化对政治信任的提升有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食品安全、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等领域的表现，对公民政府信任度的塑造影响更大。如果说抗震救灾提升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信的话，近几年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和司法不公事件则大大削弱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启发政府从那些最关键的政府职能入手提升公民对自身的认可和信任。

第二，在文化变量上，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这一变量的引入不仅使我们有机会从文化层面考察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也帮助我们更广阔的视域（如历史、现实、司法和制度等）来思考政府信任的形成逻辑。当人们面临纠纷时，会由于其特定的文化习惯、集体思维和生活经验，下意识地寻求“正当性”的解决途径，“忍”的解决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和秩序的追求，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自己解决、找人帮忙、寻求媒体等）既受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取向的影响，也是现实无奈的选择，而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则需要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还需要国家和政府提供实现法律需求的制度和渠道。从这个意义而言，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既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也具有历史的、现实的、法律的和制度的意蕴。本研究中，当面临民事纠纷时，农民选择“忍”的平均数远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数，但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绝大部分人选择了通过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冲突。至于农民为何越是采用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在基层层面，最大的可能性在于熟人社会中的政府人员角色与乡亲角色的合一，即如同《秋菊打官司》电影中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归因方向的问题。这也表明，传统文化习惯和集体思维受制于当前司法和制度的囿圄，使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做出看似不合理但却“正当性”的现实选择，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此外，城乡居民对包括“寻求私人关系”和“寻求媒体”在内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信任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较大的存量，进而社会信任被很多学者作为预测政治信任和政府信任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不仅发现了某些制度和变量与文化变量与政府信任有显著的关系，而且指出了制度和变量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政府信任的水平，当然，也不排除政府信任反过来影响某些制度或文化变量。但由于本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考察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我们未详细探讨政府信任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度和变量，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制度和变量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理解和解释。

本研究是对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探索性研究，尽管努力将各种误差降到最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的限制，样本范围并没有涵盖全国更大范围的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因此，要将研究结论推论到全国的城乡居民群体还需谨慎。第二，要研究城乡不同的文化心理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除城乡不同文化心理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排除出去，这样我们才能说不同的城乡文化心理对政府信任起作用，否则就会出现变量之间关系的混淆。虽然我们也尝试做了某些干扰变量（如收入、社会阶层等）的控制，但可能还有一些更宏观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也是未来研究要考虑的方面。第三，本研究发现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对政府信任均有影响，而且发现了它们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但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其动力机制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变量来影响？本研究对此无法做出更有效的解释。在未来的研究中，如能运用面板数据分析（panel analysis）或实验技术或许可以有效地阐释政府信任与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及其产生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 巴伯，伯纳德，1989，《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牟斌、李红、范瑞平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程金华、吴晓刚，2010，《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程倩，2009，《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胡荣，2007，《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春玲, 2004,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 《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李涛、黄纯纯、何兴、周开国, 2008,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1期。
- 侣传振、崔琳琳, 2012, 《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化比较研究——以政府绩效为研究视角》, 《现代城市》第2期。
- 梁漱溟, 1988, 《中国文化要义》, 北京: 三联书店。
- 刘欣, 2001, 《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欣、朱妍, 2011,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马得勇, 2007,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 孟天广、杨明, 2012, 《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 王春光、李炜,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和客观实在》, 《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王向民, 2009, 《U型分布: 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分布》,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 肖唐镖, 2005, 《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情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肖唐镖、王欣, 2010, 《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追踪研究》, 《管理世界》第9期。
- 杨国枢, 2004,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本土化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gger, Robert E., Marshall N. Goldstein & Stanley Pearl 1961, "Political Cynicism: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Journal of Politics* 23.
- Alesina, Alberto & E. L. Ferrara 2002,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
- Chen, Jie, Yang Zhong, Jan Hillard & John Scheb 1997, "Assess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Citizen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 Cole, Richard L. 1973, "Toward a Model of Political Trust: A Caus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 Citrin, J.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 Gamson, William A. 1968,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Hetherington, Marc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1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nny, J. 2005, "How is Trust in Government Created? It Begins at Home, But Ends in the Parliament."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 6.
- Jennings, M. K. 1998,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Roots of Devolution." In V. Braithwaite & M. Levi (eds.), *Trust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 Lian Jiang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2.
- Michelson, Ethan 2007, "Climbing the Dispute Pagoda: Grievances and Appeals to the Official Justice System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 Miler, Arthur H. 1974,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 Miller, A. H. & O. Listhaug 1990,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Norwa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 Nye, J. S., P. D. Zelikow & D. C. King (eds.) 1997,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69,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Pharr, S. 1997, "Public Trust and Democracy in Japan." In J. S. Nye, P. D. Zelikow & D. C. King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 Riker, William. H. 1990, "Political Sci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ames E. Alt & Kenneth A.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 T. J.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 Solomon, Richard 1973, "From Commitment to Cant: The Evolving Functions of Ideology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Chalmers Johnson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Tyler, Schario & David Konisky 2008, "Public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Trust and Responsiveness." Report 09-2008.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 Volcker, Paul A. 1999, "A Government to Trust and Respect: Rebuilding Citizen-Government Rel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by the Panel on Civic Trust and Citizen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Wong, Timothy Ka-Ying,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 Po-San Wan 2009, "Comparing Political Trust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Levels,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典